



■ 老徐

从西汉的易经和文化经典传承来看，易经和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不是孔子儒家，而是齐国学者。

这种传承关系以孔子对齐国学者的影响是解释不通的。孔子的弟子遍布战国各国，为什么只有齐国学者传承？齐国学者传承的不只是孔子的儒家，先秦主要文化经典都是齐国学者传承。

也就是说，齐国学者的文化传承必有齐国自己独特之所在，要到齐国去找中华文化传承的根源。

其实，这种文化根源是明显地摆在那里的，只是我们为了孔子儒家独尊，不敢和不愿去追溯齐国的文化根源。

我们都讲学术和思想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讲的就是齐国的文化现象，齐国的稷下学宫，成为了中先秦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

如果把稷下学宫跟孔子来比，孔子办了

一家私塾，弟子 2000，骨干学生 72 人。

而齐国的稷下学宫是一所大学，而且是人类第一所官办大学。

以老徐的观点，稷下学宫是由 2700 年前的管子创办，比一般的观点早出了 300 多年。稷下学宫创办的时间，由汉末“建安七子”徐干第一次明确提出的：“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尊宠之”（徐干《中论·亡国》）。但后面的人却不愿意承认徐干讲的“齐桓公”是齐桓公，在后面加了一个括号，是一个叫田午的另一个齐桓公。齐桓公田午是田齐的第二代国君，公元前 374 年至公元前 357 年在位。这个齐桓公田午史书上只有徐干这一次记载，其他别无记载。而“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尊宠之”这么多历史记载的是以管仲为相的齐桓公。

因此，齐国稷下学宫是同公元前 645 年前的管仲创办。

下面我们就讲讲稷下学宫的盛况。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

管子创办了世界第一所大学

“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子、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兒说、鲁仲连、邹爽、荀子等。尤其是荀子，曾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成为真正体现战国“百家争鸣”的典型。更为可贵的是，当时齐国统治者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了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并“受上大夫之禄”，即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养，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列传》），“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因此，稷下学宫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性质，它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政治顾问团体。

稷下学宫的学术博大精深，包含了当时各家各派的思想。就儒学而言，曾在稷下学宫中有影响的儒家学者，前有孟子，后有荀子。《盐铁论·论儒》中记：“齐宣王褒儒尊学，孟珂、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论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干有余人。”现代学者钱穆认为这段史料不可靠，孟子不是“稷下先生”（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孟子不列稷下考》），但有不少学者不同意钱穆的观点。不管孟子是否稷下先生，可以确定的是，孟子长期居齐，他的思想颇受稷下学者的影响，如孟子关于“养浩然之气”的思想，就有学者认为是受稷下先生宋钘、尹文“气论”的影响（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批判》、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等）。至于荀子，则是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个大帅，他立足儒家，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总结，从人性论、认识论、政治理论、天人关系等诸方面对稷下学术进行了吸取和修正，从而将诸子学术推向高潮，成为战国诸子学的真正总结者，其中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就是荀子的“礼法结合”的政治思想。

稷下学宫又具有培养人才，传播文化知识性质，被后人称为“田氏封建政权兴办的大学堂”，“齐国的最高学府”，其在教育史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作为教育功能，与后代学校相比，它既有一般学校的特点，又有历史的独特性。稷下学宫具有一般学校的性质和活动特点。首先学宫具有规模宏大的校舍条件，“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正说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并且相当宏伟壮观。其次，有众多的师生在开展较正规的教学活动。《战国策》载田骈有“徒百人”，《孟子》记载孟子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稷下最为前辈的学者淳于髡也有“诸弟子三千人”之称（《太平寰宇记》引《史记》）。宣王时，稷下的师生数量多达“数百千人”。由此可见师生人数之众。如此师生济济一堂，定期举行教学活动，再次，稷下学宫有较严格的规章制度。根据郭沫若的考定：《管子·弟子职》篇当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里面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从课堂纪律到课后复习，从尊敬老师到品德修养，都规定得详细严格。从此，可见当年稷下学宫的规章制度也是健全、严格的。

学宫具有独特的教育特点。游学是其教学方式之一。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老师可以在稷下招生讲学，即容许有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这些游学方式的施行，就使士人们开阔了眼界，打破了私学界限，思想兼容并包，促进了各种学说的发展和新兴学说的创立，大大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稷下学宫便成为教育人才的中心。

稷下学者总是针对当时的热点问题阐述政见。他们学识渊博，长于分析问题，在表述上旁征博引，穷尽事理，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同时，由于稷下学者学派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异，而会竟长论短，争论不已。最终促进了稷下学宫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形成，使稷下成为当时发展学术、繁荣学术的中心。

在学术上，稷下学宫具有兼容百家之学，多元思想并立，各家平等共存，学术自由，相互争鸣，彼此吸收融合等多方面的特点。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五行家、纵横家、兵家等各种学术流派，都曾活跃在稷下舞台上。稷下学者因政治倾向、地域文化、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差异，各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从而使稷下学宫形成了思想多元化的格局。在这种形势下，稷下各家为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相互间展开论争，使稷下学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在论争中，不仅充分展示了各自的理论优势，而且使学者们也认识到各自的理论弱点，促使他们不断吸收新思想，修正、完善、发展自己的学说。论争促进了不同学术见解的思想渗透和融合。

因此，郭沫若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的一个最高峰的。”（郭沫若《十批评书·稷下黄老学派批判》）总之，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发展，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开创了百家争鸣的一代新风，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学术文化大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同时，稷下学开启秦汉文化发展之源，对秦汉以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

稷下学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仅就稷下学者的著作来看，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道德伦理、文学艺术以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农等多学科的知识。这些著作的问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先秦思想理论宝库，促进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的繁荣，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

以现在的学术观点，稷下学宫基本上伴随着中国的战国时期，到秦王朝统一六国，丞相李斯和韩非子都是稷下学士，也就是他们都毕业于稷下大学。这与西汉文化和学术的传承就直接接轨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中华文化的传承归功于孔子儒家，而不回归到历史的真实原则上和真相？

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发展成果的年度展示——评黄泰岩等著《中国经济学发展报告(2016)》

■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白卫星

两个月前就接到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黄泰岩教授的《中国经济热点前沿(第 13 辑)》(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年 12 月出版)一书，但我还是盼望看他的《中国经济学发展报告(2016)》(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年 12 月出版, 24 万字)。因为作者将往年的《中国经济学发展报告——中国经济热点前沿》拆分为《中国经济学发展报告》和《中国经济热点前沿》，前者专门阐述经济学各学科的发展，展示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最新进展，后者专门阐述中国经济研究的十大热点问题，展示中国经济学的学术体系。为何将《中国经济学发展报告——中国经济热点前沿》一拆为二？黄泰岩教授在前言中说：“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任务；二是倾听读者的呼声，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要，突出本书的专业化、精准化。”这是作者长期自由徜徉于经济学海洋的满足与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创新升华。我粗略看了拆分后的两本书，感觉都从侧面展示了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已经成为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学术品牌。

我赞成这样的一拆为二。独立出来的《中国经济学发展报告(2016)》由总论、理论经济学研究新进展、应用经济学研究新进展三部分构成。总体看，《中国经济学发展报告(2016)》汇集了过去一年的最新学术成果，专业更突出，主题更鲜明，可谓是 2015 年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发展的理论精要荟萃，并对其作了系统而全方位的学术梳理展示，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研究的描述突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方向、新发展理念和基本方法后，以刘伟、洪银兴、卫兴华、顾海良等经济学家为代表，迅速在《光明日报》集体发声，展开讨论，就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用中国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理论共识。不论是理论经济学，还是应用经济学，以及两个一级学科下属的任何一个二级学科的学科体系构建，都要体现中国特色。“因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需要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得到进

一步的验证和完善，但它已经成为解释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难题最科学的理论。”中国经济学家理应创造出与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相匹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说和体系，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中国贡献。因此，“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研究新进展”作为该书的总论，也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报告》的灵魂。特别是黄泰岩教授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逻辑主线、结构框架，提出了拔新领异的观点，我认为是有创新意识、开放包容、思维严谨的，符合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是“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重要一笔。

二是描述全面。从理论经济学看，该书对 2015 年度的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经济史学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分别进行了学术梳理。其中政治经济学部分，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作了详细的综述。从综述内容所引用的期刊看，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和《经济动态》《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研究》等经济学排名靠前的知名学术媒体外，出现了《兰州商学院学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南京社会科学》《内江师范学院学报》等普通综合性社科期刊。一方面反映出我国主流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都在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克服偏重发表应用经济学成果的倾向，给理论经济学应有的篇幅或倾斜。另一方面反映出不少学者提高了认识，加强理论经济学研究的自觉性在快速提升。从应用经济学看，国民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学科的研究进展较大，成果丰硕。当然，我说对二级学科的描述全面，还体现在新增加的劳动经济学和国防经济学。我去年在《评〈中国经济热点前沿(第 12 辑)〉》一文中说，作为二级学科的国防经济学在此书里却难觅踪影，希望在 2016 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学发展报告》弥补这个遗憾。增加劳动经济学和国防经济学，是黄泰岩教授秉承不断完善、使其越来越美的理念使然，也是他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沉静好学驱使，更是他国防意识和国防情怀的真诚体现。

三是描述专业。从该书第十一章“国防经济学研究新进展”看，对军民融合、国防经济动员、国防经济安全等进行了精细描述，基本囊括了国防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观点。比如军民融合问题，对其定位、国防科技工业的军民



融合、国防科技的军民融合、国民经济动员的军民融合、军工企业的军民融合，都给予了专业性描述，所综述的观点反映了 2015 年国防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从引用的文献看，有姜鲁鸣、杜人淮、孙燕、曾立、李凌等专家学者的成果，这与《经济学家周报》不久前发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防经济学年度人物”评选结果基本一致。

《中国经济学发展报告(2016)》虽然就 2015 年度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的全

景式展示，但从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进入到自主创新的时代要求来看，我认为作者在选取学术期刊样本时局限于 CSSCI 来源期刊（当然，作者选取的 CSSCI 来源期刊有一定的代表性，是经济学期刊的最高水平），对部分学科发展的描述可能略显不足。比如，该书在“劳动经济学研究新进展”一章，就没有《劳动经济研究》期刊发表的文献。《劳动经济研究》（非 CSSCI 来源期刊）创刊于 2014 年，是中国第一本劳动经济学专业学术期刊，主要发表

就业、工资、收入分配、卫生健康、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人力资源等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原创性论文。再比如，在“区域经济学研究新进展”一章，作者引用的 22 篇文献中，只有 2 篇出自《区域经济评论》；从《中国经济热点前沿(第 13 辑)》第十一章“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新进展”看，没有一篇《区域经济评论》的文献。我仔细查阅 2013 年、2014 年度的“区域经济学研究新进展”引用的 83 篇、90 篇文献中，分别有 3 篇和 5 篇出自《区域经济评论》。《区域经济评论》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刊，尽管目前还不是 CSSCI 来源期刊，但却是引领区域经济学发展前沿的重要期刊。我认为程必定先生的《中国区域空间结构的三次转型与重构》（见《区域经济评论》2015 年第 1 期）、金碚先生的《新常态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维》（见《区域经济评论》2015 年第 3 期）属于 2015 年度区域研究的重要文献，应该在“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新进展”或“区域经济学研究新进展”中有所体现。还有一篇发表于《经济地理》2015 年 12 期的重要文章——《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从 1.0 版到 4.0 版》（作者：胡鞍钢、周绍杰、鲁钰锋、地力夏提·吾布力）从战略高度系统分析了建国以来区域发展战略的四个版本，是阐述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理论成果。“区域经济学研究新进展”一章没有把胡鞍钢先生的这篇文献观点综述进来，也是一个遗憾。当然，这也许与作者在选取描述的内容或重点可能有一定关系。但我希望尽量把二级学科的专业期刊和非 CSSCI 来源期刊所刊载的相关文献也作为学科研究新进展所描述的重要内容，使各种观点都尽可能综述到报告中，更好地推动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

写到这里，我想到全国数百家出版社每年都出版了大量的经济学理论著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值得《中国经济学发展报告》收录描述的。尽管这项工作纷纷籍籍，但我对以黄泰岩教授为首的作者团队充满期待——《中国经济学发展报告(2017)》会更精彩，更有魅力，学术成果的集聚效应更明显。

作为连续 13 年不间断的学术工程及业已铸就的学术团队文化，《中国经济学发展报告(2016)》的出版面世，对增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提升中国经济学的软实力，获取经济学世界的中国话语权，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